

◆ 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资料文库 ◆

邯郸考古研究

乔登云考古文集

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 编



科学出版社

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资料文库

邯郸考古研究

——乔登云考古文集

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 编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文集共收录各类论文、田野考古及考察研究报告等26篇,地域范围以邯郸境内为主兼及冀中南豫北地区,年代界限纵跨新石器时代、夏商周至元明清各代,内容包括新石器时代磁山文化、后冈一期文化、东万年文化和后冈二期文化,先商时期下七垣文化,以及战国以来赵都邯郸故城、先秦赵国城址、佛教造像、墓葬碑志、磁州窑陶瓷、长城关隘和古运河研究等各个方面,对了解邯郸人文历史、城市变迁、文化脉络和文明成就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邯郸考古研究:乔登云考古文集/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6. 4

(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资料文库)

ISBN 978-7-03-048020-0

I. ①邯… II. ①邯… III. ①考古工作—邯郸市—文集 IV. ①K872. 22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9535号

责任编辑:李 茜 范雯静/责任校对:钟 洋

责任印制:肖 兴/封面设计:北京美光制版有限公司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年4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6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34 插页:12

字数:797 000

定价:25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目 录

邯郸考古世纪回眸与前瞻·····	1
豫北冀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回顾与展望·····	20
磁山文化墓葬遗迹初探——从磁山遗址“组合物”的性质谈起·····	34
关于磁山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45
磁山下潘汪遗址仰韶文化遗存的分析·····	57
下潘汪第二类型仰韶文化有关问题的讨论·····	63
冀南豫北地区龙山时代早期文化初探·····	73
磁山下潘汪遗址“龙山文化”遗存辨析·····	92
邯郸境内先商文化研究·····	107
河北磁县几处先商遗址的考古发现与探索·····	137
赵都邯郸故城考古发现与研究·····	150
邯郸境内先秦赵国城址考察与探索·····	167
试论邯郸古城的历史变迁·····	178
邯郸邺城周围北朝时期单体佛教造像初论·····	195
魏赠骠骑大将军冀州刺史游松墓志铭考·····	218
唐工部尚书宋庆礼墓志铭考辨·····	237
浅谈宋金元时期磁州窑仿烧工艺的发展——以峰峰临水三工区、彭城盐店窑址 为例·····	266
河北永年石北口遗址发掘简报·····	279
永年县石北口遗址发掘报告·····	290
邯郸城区唐代墓群发掘简报·····	361
河北鸡泽县唐代墓葬发掘简报·····	385
河北邯郸临水北朝至元代瓷窑遗址发掘简报·····	401
彭城盐店磁州窑遗址发掘简报·····	432
邯郸长城考察报告·····	472
古运河邯郸段考察报告·····	493
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文物考古工作四十五年·····	514

邯郸考古世纪回眸与前瞻

邯郸市位于河北省南端，下辖19个县、市、区，总面积11536.6平方千米。市境西依太行山、东跨华北平原，以京广铁路为界，西部为巍巍群山、起伏丘陵，东部为广阔平原、无边沃野，黄河故道、漳河、滏阳河、洺河及其支流纵横交错、遍及全境。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在这片土地上栖居、繁衍、生息，孕育和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遗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存。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大量文物遗存得到发现，并逐步得到认识。

一、20世纪邯郸考古工作历程

邯郸境内现代考古最早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截至20世纪末，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末，属初始阶段或起步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前，从事考古研究的机构还很少，工作范围和研究对象也非常狭窄，主要集中在赵邯郸故城及南、北响堂寺石窟的调查研究几个方面，所获资料对于现在乃至今后的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当时的考古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项：抗战以前，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王湘在安阳殷墟发掘时，于1935年对豫北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在包括涉县、武安（原属河南省）等六县境内发现龙山文化遗址31处，并编写了《豫北考古调查报告》（未发表）^[1]。同年，前北平研究院考古组还分别对今临漳邺城遗址^[2]，峰峰矿区南、北响堂寺石窟及其附近石刻进行了实地调查，后者并编印了《南北响堂寺及其附近石刻目录》。1936年，中国营造学社刘敦桢及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也先后对南、北响堂寺石窟进行了调查，分别发表了《河北古建筑调查日记》和《响堂山石窟》。日本侵华时期，日本东京大学原田淑人、驹井和爱等与北京大学姚鉴、贾惠定，于1940年对赵邯郸故城及其附近古迹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一是对赵王城和“大北城”西北区、丛台等建筑遗迹及邯郸西郊林村、西大屯、下庄一带的20余座古墓进行了踏查；二是对赵王城西小城内南北一线排列的一、二、三号夯土建筑台基进行了局部清理或解剖，出土较多砖、瓦构件及部分碗、豆、刀币

等遗物，并在二号台基上东、西侧各发现两排并列的石柱础；三是对“大北城”西北区的建筑台基梳妆楼和插箭岭遗址进行了局部清理，在梳妆楼基址上发现了河卵石铺砌的建筑散水、柱础石、砖瓦、“千秋万岁”瓦当及“半两”“大泉五十”钱币等汉代遗迹、遗物，在插箭岭发现了大量形式不一的青铜箭头等。此次调查和试掘出版了《邯郸——战国时代赵都城址的发掘》。抗战胜利后，尹达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工作时，于1946年在邯郸城郊王朗村（俗名朗村）附近发掘清理了一座大型汉墓，首次发现散乱的穿孔玉衣片，有的孔中残留有铜锈，可能为铜缕玉衣，并伴出鎏金铜饰、嵌琉璃铜饰和陶舞俑等，据说为西汉赵敬肃王之孙象氏思侯刘安意之墓^[3]。

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为初步发展时期。

1955年以前，各省市文物考古机构尚未建立或力量较薄弱，考古工作主要为国家机构有关专家进行的零星调查。1956~1966年的10余年间，邯郸考古得到迅猛发展，一是1957年、1962年峰峰南、北响堂寺石窟和邯郸赵王城率先成立了文物保护组织，二是省文物考古机构及大专院校相继在本区开展大规模的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并取得重大收获。至60年代后期的“文革”时期，考古工作基本停滞。

本时期的主要考古活动有，1951年，古陶瓷学家陈万里先生对京广铁路沿线磁县和峰峰矿区境内的观台、冶子、彭城等著名的磁州窑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4]。1952年8月，古建筑学家祁英涛、罗哲文等对南、北响堂寺石窟进行调查^[5]。1956年全区开展文物调查，5~11月，省文物发掘组对武安午汲古城进行钻探发掘，在古城西半部探明古墓41座、窑址25处、枯井18眼及灰坑145处，并对其中的21处窑址、26座周汉墓葬及部分路面、水井、窖穴和居住址进行了发掘清理。1957年初，为配合京汉铁路复线建设，省文物工作组对磁县讲武城古城址及“七十二疑冢”（北朝墓群）进行调查，并对古城周围的古墓进行了抢救发掘；同年4~8月，省文物工作队还对邯郸涧沟遗址、百家村战国墓进行了发掘，发现部分窖穴、窑址、灰坑、墓葬及沟渠，出土文物1570余件；其后不久，又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组成邯郸考古发掘队，继续对涧沟、龟台寺遗址和齐村、百家村一带的战国墓进行清理，北大师生并分组对邯郸市郊、峰峰矿区等地进行了考古调查，对南、北响堂寺石窟进行了调查实测；年底，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又对临漳邺城遗址进行了踏查^[6]。1958年初，省文物工作队为配合水利工程，首次对磁县观台窑址进行发掘，发现瓷窑炉2座、石灰窑炉1座、炼焦炉3座，出土及收集瓷器等文物2600余件；同年夏，省文化局邯郸发掘组在市区内的王朗村清理汉墓52座，出土文物百余件。1959年，原河北文化学院师生在邯郸实习期间，于邯郸百家村清理战国墓41座、汉墓10座，出土文物2600余件；6月，古陶瓷学家冯先铭先生等对磁县部分瓷窑址进行调查，于贾壁村发现隋代青瓷窑址1处，并采集部分标本；同年秋，省文物工作队为配合岳城水库建设工程，对磁县境内水库淹没区进行考古调查，发现古遗址6处、古城址1处、古墓群2处、古瓷窑址4处，并于同年冬对其

中的下潘汪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对英烈村遗址进行了试掘,在下潘汪遗址内发现后冈一期、大司空村、龙山时期、商周至战汉等多期文化遗存,在英烈村遗址发现西周文化遗存。1960年上半年,又对库区内的界段营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仰韶时期、商代、西周与战国等文化遗存,清理古墓38座;同年夏,省文物工作队对武安、永年两地洺河中游两岸进行考古调查,发现赵窑、台口、石北口等新石器时代至商代的聚落遗址12处,并对其中的台口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仰韶时期向龙山时期过渡阶段及龙山时期两期文化;秋季,与原河北文化学院师生联合对武安赵窑遗址进行发掘,发现后冈一期文化上下两期及商周等多期遗存,并清理商代墓葬20余座,出土陶、铜、玉石等各类文物500余件。1960~1961年,为配合岳城水库建设,省文物工作队再次对观台窑址进行大规模的发掘,清理面积达2100平方米,发现有窑炉和作坊,并出土大量遗物^[7]。此后数年间,主要为考古调查、勘探和小型清理工作。1962年,曲周县东风渠发现宋代遗址。1963年,武安西土山村发现宋绍圣二年(1094年)壁画墓。1964年4月,故宫博物院李辉柄先生等又对磁县观台、冶子、东艾口等磁州窑遗址进行调查,采集了大量瓷器标本^[8]。1965年初,罗平再次对邯郸百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调查;7月,永年施庄发现并清理一座唐墓^[9]。1966年底,邯郸地区开挖民有渠,于磁县下七垣村南发现商代铜器墓。此外,1957~1959年,省文物工作队对赵王城进行调查勘探,并发现了大北城西垣地下墙址;1965~1966年,省、市联合再次对赵王城及大北城西北区插箭岭一带进行勘探调查和测绘。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末,为全面发展时期。

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沉寂数年的考古工作又重新焕发出活力,且以强劲而稳健的势头迅速向前发展。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或进步是,考古专业队伍已由中央和省、市等少数专门机构,逐步发展至地、市、县等基层单位。80年代前后,地区及各县、市相继建立了专门的文物保护机构,1983年中央与省考古机构还在临漳邺城专设了邺城考古队,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工作,形成了多层次的文物保护及考古研究网络,以配合基建为主、主动为辅的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得到全面发展。

考古调查和勘探方面,一是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中后期,全区普遍开展了两次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及查漏补缺工作,1988年河北省还在涉县专门举办了全省古建筑调查培训班,并开展调查,消灭了空白点,使全区文物遗迹总数猛增至1500余处。二是配合基本建设工程开展专项考古调查和勘探,其中较重要的有:1970~1979年,在配合“人防”工程建设中,于邯郸主城区下发现了赵邯郸故城“大北城”址,于峰峰矿区峰峰村、石桥村、新市区、彭城镇地下发现了宋金地道遗迹;1989年以来,在配合邯郸市城区建设过程中,对城址内外古代文化遗存的分布及面貌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1993年对京深高速公路、1996年对邯峰电厂、1998年对邯济铁路邯郸段和1999年对邯长铁路武安段的调查和勘探,均发现了大批较重要的古代文化遗存。三是有关文物考

古机构先后多次开展专题考古调查或勘探,如,1972~1973年,省、市联合对赵邯郸故城“大北城”进行全面钻探调查;1976~1977年,临漳县文化馆对邺城遗址的调查和钻探;1979~1982年冬,省、地、市文物部门联合进行武安洺河流域考古调查;1981年夏和1986年,邯郸地、市及邺城考古队与磁县文物部门分别对所辖范围内的磁州窑遗址进行调查和复查;1982年,市、区联合对南、北响堂寺石窟和小响堂石窟(水浴寺)进行调查测绘;1983年以来,邺城考古队对临漳邺城遗址进行全面细致的调查、勘探;1996年冬,市、县联合调查武安、涉县境内明代长城遗迹等。此外,还有大名县万堤农场唐代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墓、涉县中皇山北齐佛教摩崖刻经、磁县观兵台磁州窑遗址等专题调查。

遗址发掘方面主要包括,1973年冬,市文物部门对武安磁山遗址进行的试掘。1974年7月至次年4月,省、市等部门联合对磁县下七垣遗址进行发掘,发现先商至商代早、中、晚四期遗存,并清理商代墓葬23座,学术界还将其中的先商文化遗存命名为下七垣文化。1975年,对武安赵窑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发现仰韶、先商及商周等多期遗存,清理商代墓葬52座。1976年下半年,磁县文化馆于磁县南开河清理发现元代木船遗迹6条,出土精美的陶瓷、铁、铜、木、石、琉璃等器物近500件。1976年冬至1978年,省、市等文物部门联合对武安磁山遗址进行发掘,揭露面积2579平方米,发现一种全新的、较仰韶文化早1000余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并被学术界命名为磁山文化。此后,1985~1988年及1994~1998年,省、地、市等文物部门联合,又多次对磁山遗址进行过发掘。1977年和1979年,还对武安洺河流域的牛洼堡、西万年、东万年、城二庄等4处遗址进行试掘,除两处发现有磁山文化遗存外,东万年遗址还发现有龙山时代早期遗存。1979年,市文物部门对北响堂常乐寺遗址的清理,发现大量建筑材料、石造像和生活用具。地区文物部门对武安固镇古城附近冶铁遗址改线汉墓的发掘,发现炼铁炉及铜器墓等主要遗迹。1983年以来,邺城考古队对邺城遗址的朱明门、铜爵台、护城河等基址进行发掘解剖,获取了大量资料和信息。1986年初,省、市文物部门分别对永年县临洺关遗址及邯郸县康河、西店子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试掘;同年4月至次年6月,省、地文物部门还对永年石北口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发掘,揭露面积2000平方米,发现房基1座、窖穴和灰坑96个、墓葬8座,出土各类器物1000余件,解决了后冈一期文化不同遗存间的年代及演变发展关系;与此同时,省古建研究所对南响堂石窟1、2窟石砌洞门及3~7窟顶部填土的清理,新发现北齐窟檐遗迹、龕像和隋代碑刻。1987年3~7月,北京大学与省文研所等对磁县观台磁州窑遗址的联合发掘,发现窑炉9座,加工原料的大碾槽1座,出土各类瓷器2000余件,解决了北宋至金元时期磁州窑瓷器的分期和年代问题。1988年,地、县文物部门对永年何庄遗址和墓葬的发掘,发现先商文化等重要遗存。1994年,配合京深高速公路建设,省、市等文物部门联合对永年榆林遗址的发掘,发现龙山、西周、汉代多期遗存;对

邺城遗址的发掘,发现北朝时期路面、沟渠、釉陶与砖瓦窑炉及大批战国至魏晋时期的墓葬。1994~1995年,省、市等文物部门对涉县新桥遗址的两次发掘,填补了邯郸旧石器时代遗存的空白。1996年,省、市联合对邯峰电厂义西、北羊台等两处遗址进行发掘,除发现有大量先商文化遗存外,前者还发现后冈一期、大司空村两类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地层叠压关系。1997年,市文物部门发掘了成安南街寺庙遗址,出土大量北朝至隋唐时期的石造像、建筑构件和生活用具。1999年,对彭城盐店磁州窑遗址的发掘,发现元、明、清三期堆积和部分窑炉、作坊。此外,1973~2000年,市文物部门在配合城市建设中,还对赵邯郸故城赵王城城垣上多处排水槽和铺瓦遗迹、大北城“王朗城”和“灵山”段城垣以及城区内数十处地下遗址进行了解剖清理。

墓葬发掘方面,除遗址发掘中所涉墓葬外,较重要的还有:1970~1972年,市文物部门对邯郸市南郊张庄桥两座大型多室砖墓的发掘,出土大量玉衣片和带铭铜器,推测为东汉末赵王的陵墓^[10];1975年发掘的车骑关汉墓,为石砌拱券结构,内设“黄肠题凑”椁室,残存陶器上并有“御酒一石”等朱书题记,推测亦属汉代赵王之墓^[11];1974~1979年,磁县文化馆对东魏茹茹公主冢、尧赵氏胡仁、北齐文昭王高润、赵州刺史尧峻、元良墓的清理,证明传称的“曹操七十二疑冢”实为东魏、北齐王陵及贵族墓区;1978年,省、地文物部门对赵王陵3号陵1号陪葬墓的发掘,证明传称“赵王陵”确属战国时期赵国的王陵区;1980年,市文物部门于邯郸市郊清理了明刑部尚书张国彦墓,墓室由白灰砂浆浇铸而成,且出有珍贵的墓志资料^[12];1982年,地区文物部门对涉县北关战国大型木椁墓的发掘,发现“积石积炭”设施,并出土成套青铜礼乐器、车马器等100余件;1985年发掘的磁县孟庄北齐元始宗墓,出土陶俑及陶瓷器140余件;1987年,邺城考古队发掘了磁县湾漳北朝大墓,地面有石刻人像,墓室及壁画宏伟壮观,残存随葬品达2000余件,推测应属北朝帝王陵墓^[13]。此外,80年代以来,省、地、县文物部门还先后对涉县寨上东周墓、北关及索堡汉墓、东达宋墓、永年娄山晋墓及临洺关北东街宋金墓、鸡泽北关及尹村唐墓、邱县郭庄及陈村唐墓、霍庄宋墓、邯郸县北张庄金墓、峰峰矿区农电局金代崔仙奴墓、磁县城南元墓及观台北宋漏泽园等50余座墓葬进行了清理,市文物部门还对邯郸县南吕固唐墓和邯郸市第一医院、中心医院、博物馆、电业局、铁路医院等处数十座战国、唐、宋墓,以及市郊百家村、齐村、彭家寨、酒务楼、邯钢厂区等20余处近千座战汉至明清墓进行了发掘,为各时期葬制的研究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

二、20世纪邯郸考古发现与研究

20世纪邯郸考古工作已走过了60多年的风雨历程,工作是艰辛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所取得的收获也是非常巨大而显著的。

（一）旧石器时代考古

邯郸旧石器时代考古起步较晚，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有所突破。1990年，省文物部门于太行山东麓地区的武安磁山、涉县新桥等地发现旧石器地点；1994年，省、市文物部门又在涉县的中原、河南店、西戌等地发现旧石器地点，填补了我市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空白。1994~1995年，省、市、县文物部门及有关院校还联合对涉县新桥遗址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考古发掘，获得大量石制品，使我们对本区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面貌、特点和年代有了初步了解^[14]。

新桥遗址可能是一处临时性的石制品制作场所，地质年代属中更新世晚期，文化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早期偏晚阶段。所出石制品具有如下特征：石料就地取材，以石英砂岩和石英岩为主；打片基本用锤击法，偶用砸击法；石核多厚重，利用率不高；石片较大，形状多不固定；石制品成品率极低，修理方法均为锤击法，加工方式多样，以正向或反向加工居多，复向、交互和错向加工较少；石器以大中型为主，器类以刮削器略多，砍砸器和球形器其次，还有少量雕刻器。从石制品的特点来看，在石料选择、打片方法、主要器类、修理方法和加工形式等方面，与华北地区以北京猿人和蓝田猿人为代表的两大文化系统，即以小型石片工具为主和以大型工具为主的两种旧石器早期文化遗存，特别是后者存在很多相似之处，说明其间可能有着某种传统影响；但石核多厚重，石片较大，大中型砾石工具占优势地位，器类主要为砾石和大石片加工的刮削器、砍砸器及石球，并伴生大量的砾石，又与华南旧石器早期文化有着许多共同之处，这可能是我国南北过渡地带诸文化交流的结果。

（二）新石器时代考古

邯郸是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最丰富的地区，由于河流冲刷、淤积等地理变化，现主要发现于京广铁路以西、太行山以东的邯郸、峰峰、武安、涉县、磁县、永年以及相邻的临漳、鸡泽等海拔相对较高的县区境内，总数已达200余处。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可知，邯郸所处太行山东麓，即豫北、冀中南地区，是我国新石器时代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同时又与其他相邻地区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所以各时期文化面貌差异较大。不过我们基本上可以勾画出本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序列，并对各时期的文化面貌、相互关系有了不同程度的认识。

邯郸境内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可分为中、晚两期，年代序列为：磁山文化→后冈一期文化→庙底沟文化→大司空村文化→东万年类型遗存→后冈二期文化。其中磁山文化属新石器时代中期，后冈一期、庙底沟和大司空村文化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前段仰

韶时期，东万年和后冈二期文化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龙山时代。

磁山文化是1976年由武安磁山遗址最先发现而得名的^[15]，主要分布于豫北冀中南太行山东麓地区，邯郸境内除武安洺河流域发现4处外，磁县漳河流域也有少量线索。从磁山遗址和经试掘的武安牛洼堡、西万年遗址来看，陶器以夹砂陶为主，约占85%以上，泥质陶较少；器表多为素面，纹饰主要有绳纹、条形附加堆纹、压印编织纹、压印篦纹、刺剔纹等；器类包括直壁筒形盂、鸟头形支脚、深腹罐、小口壶、三足钵、圈足罐、碗、盘、漏斗形器等，并以直壁筒形盂、鸟头形支脚数量最多，特征最明显。石器有带足石磨盘、磨棒、斧、铲、凿等。遗迹以长方形竖井式窖穴和陶石器“组合物”最具特点。更为重要的是窖穴中多发现有数量不等的炭化粟堆积，并发现较多炭化胡桃和家鸡等动物骨骼。经测定，磁山文化的年代距今约8100~7600年，是黄河下游太行山东麓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存，也是20世纪70年代我国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它不仅在文化面貌和年代上突破了已知仰韶文化的界限，拉开了探索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序幕，而且在粟作农业和家鸡的起源、原始宗教信仰的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一定的进展。

后冈一期文化，过去多将其归入仰韶文化范畴，称之为仰韶文化后冈类型，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文化区系类型学说的确立和研究的深化，才逐步认识到这是一种与仰韶文化大体同时而渊源关系不同、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后冈一期文化的分布范围大体与磁山文化相当，邯郸境内有着普遍的分布，遗址总数达数十处，经试掘或发掘的遗址包括磁县下潘汪、界段营、武安赵窑、西万年、永年石北口、邯郸西店子、齐村、峰峰义西等多处。据石北口遗址发掘资料^[16]，可将后冈一期文化分为三期六段，其总的特点为：陶器以细泥红陶为主，器物表面以大量“红顶”为装饰，彩陶不发达；器类主要由炊具釜、灶、支脚或鼎、罐，汲水器长颈瓶、小口壶、双系罐以及众多的钵、碗、盆等器物所组成。其中早期以复合式炊具釜、灶、支脚为主，不见鼎，彩陶刚开始出现，花纹主要为镶边窄带纹，偶见平行竖线纹；中、后期以连体炊具鼎为主，釜很少，彩陶开始流行，花纹相对增多。而石家庄以北地区釜和支脚则始终占据重要地位，鼎则自南而北递减，彩陶花纹也有一定区别，这主要是由于地域不同而造成的。后冈一期文化早期与磁山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承袭发展关系，如炊具均以复合式炊具为特点，均流行小口双耳壶和深腹罐等，但其间还存在着较大的缺环。据测定，后冈一期文化的年代距今约6700~6000年，与已知磁山文化晚期还存在着近千年的距离。

庙底沟文化是太行山东麓地区继后冈一期文化之后出现的新的考古学文化。学术界普遍认为，庙底沟文化原发于甘肃陇东、陕西关中及豫西、晋南地区，属仰韶文化的一个发展阶段。现已初步查明，邯郸境内至少存有庙底沟文化遗址20余处^[17]，这不仅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项重要发现，为研究庙底沟文化的扩张范围、繁荣状

况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且也填补了本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段空白。该遗存总的特点为: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其次为夹砂红陶;器表除素面外,以绳纹、麻线纹和彩陶较常见,彩陶花纹多为黑彩,也有少量白衣或镶白边黑彩,花纹母题主要有勾叶纹、花瓣纹、宽带纹等;常见器形有小口尖底瓶、罐、钵、碗、盆等。因所调查的遗址均未经正式发掘,所以对该遗存的整体面貌还不太清楚,不过可以确定,庙底沟文化是一种外来文化,与本区较早的后冈一期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从永年石北口遗址三期后段遗存中发现有庙底沟文化常见的釜形鼎和大量“铁轨式”口沿绳纹罐可知,庙底沟文化自后冈一期文化末期便开始向本区渗透,最终将当地土著文化全部取代。据推测,其大致年代应在距今6000~5500年。

大司空村文化主要分布于冀南豫北地区,过去也多将其归入仰韶文化系统,称之为“大司空村类型”,河北境内同类遗存还曾另名为“百家村类型”,但未得到考古界的公认。邯郸境内大司空村文化遗址发现较多,经试掘或发掘的遗址有邯郸百家村,磁县下潘汪、界段营,武安城二庄,永年台口、临洺关等多处。其总的特点为: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其次为泥质和夹砂红陶,另有少量黑陶;纹饰以篮纹、绳纹、弦纹、划纹、附加堆纹和彩陶较常见,彩陶花纹以红彩和紫红彩为主,黑彩较少,花纹母体主要有弧边三角间平行线纹、水波纹、蝶须纹、网格纹等,另有较多繁杂的点缀花纹;器类包括钵、碗、盆、盘、豆、罐、甗、鼎、罍等,另有较多的陶环。大司空村文化与后冈一期文化一样是冀南豫北地区最常见的考古学文化之一,对于两者间的年代关系或孰早孰晚问题,过去曾进行过长时期的讨论,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永年石北口和峰峰义西遗址^[18]的发掘证实,大司空村文化不仅明显晚于后冈一期文化,而且其间还存在着较长时间的距离。目前因发掘材料较少,所以对大司空村文化整体面貌的了解还很不全面,但其属于庙底沟文化之后兴起的一种独具地方特色的新的考古学文化,并逐步向龙山时代文化过渡,年代约在距今5500~5000年当毫无疑问。

邯郸境内龙山时代早期阶段遗存可以武安东万年遗存为代表^[19]。目前所知,同类遗址还有武安马小河、近古等10余处,但由于均未进行过正式发掘,所以,对其整体面貌还了解不多。总的来看,陶器以泥质和夹砂灰陶为主,其次为泥质和夹砂红陶,并有较多的泥质磨光灰黑陶;纹饰以篮纹为主体,间有轮弦纹、绳纹、附加堆纹及少量压印方格纹;器形以高领罐、花边罐、豆、甗、钵、杯及竖鼻、横耳为特征。上述现象虽然很多已具有中原地区龙山时代诸文化的特点,但与本区龙山时代最常见的后冈二期文化还存在一定的差别,如陶器火候较低,红陶还比较多,尚不具备“光、薄、折”等特点。因此认为,该遗存大体上上承大司空村文化,下启龙山时代后段后冈二期文化,当属仰韶时代向龙山时代的过渡阶段或早期龙山阶段。关于该遗存的年代,目前还没有测定数据,估计与河南早期龙山阶段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相当,大体距

今约5000~4700年。

后冈二期文化是豫北冀中南即太行山东麓地区最常见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之一，过去多将其归入龙山文化系统，为反映其与典型龙山文化之间的差别，称之为“河南龙山文化”。但随着文化区系类型学说研究的深入，人们已逐渐认识到其实际上是一种与龙山文化时代相当而渊源不同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也即中原地区龙山时代诸考古学文化之一。据有关测定数据可知，后冈二期文化的绝对年代大体在距今4700~4100年前后，约当我国原始社会末期阶段。经初步调查，邯郸境内共发现后冈二期文化遗址50余处，其中邯郸涧沟和龟台，磁县下潘汪，永年台口、榆林等遗址曾经过发掘。出土遗物中，陶器以泥质或夹砂灰、褐陶为主，其次为黑陶和红陶，另有少量黄陶和白陶；器表除素面和磨光外，纹饰以篮纹或绳纹为主，其次有方格纹、划纹、弦纹、附加堆纹等，另有少量压印雷纹、朱绘或朱、黑、黄、白多色彩绘；器类以鼎、鬲、鬲、甗、深腹罐、平底盆、瓦足盆、瓦足盘、豆等较常见。值得注意的是，涧沟遗址内还发现了古代最早的水井，并在一眼废井内发现五层被砍死和活埋的人骨，有的头骨还有剥皮现象，为研究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生产关系的变化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20]。

（三）夏商西周考古

夏、商、周三代是我国早期文明时代，而商部族即起源于邯郸境内的漳河流域，因此，本期考古最明显的特点是，基本上所有遗存均与商部族和商文化的兴衰过程有关。当时的文化遗存仍以京广线以西的西部地区最常见，这是由于本区西高东低、东部淤积较厚的地理特点造成的。

夏代是一个部族纷繁、邦国林立的时代，与夏部族大体同时的商部族即起源于邯郸境内漳河流域，并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因其所处时代在商部族立国之前的夏代，故学术界多将其称之为先商文化或下七垣文化。而所谓先商文化或下七垣文化，就是以邯郸涧沟、磁县下七垣遗址^[21]所属遗存而命名的。据不完全统计，邯郸境内共发现先商文化遗址近百处，经发掘的遗址包括涧沟、龟台、义西、北羊台、下潘汪、界段营、下七垣、赵窑、何庄等10余处。出土遗物中，陶器仍以灰陶或灰褐陶为主，磨光黑陶也占有一定比例；纹饰以绳纹为主，另有部分弦纹、楔形点纹、附加堆纹、涡纹等，有的还保留有少量篮纹；器类以鬲、甗、鼎、甗、罐、瓮、盆、豆、器盖较常见，并以薄胎卷沿细绳纹鬲、三角足鼎、绳切纹花边罐、平口折唇卵形瓮、觚形豆最具特点。生产工具除斧、铲、镰、刀等石器外，还发现少量青铜刀、镞等，虽然数量很少，但说明当时已进入青铜时代。先商文化的确立，不仅是商文化研究的重大突破，也是夏商周考古的一项重要收获。

商承夏制，建立了我国历史上又一个统一的奴隶制王国，从汤至纣前后延续约500年。邯郸不仅是商部族的重要发祥地，而且北与祖乙邢都为邻，南与盘庚殷都接壤，商代遗存有着广泛的分布，遗址总数达200余处，邯郸洺沟、龟台、下潘汪、界段营、下七垣、赵窑等遗址并经过科学发掘，发现和出土了大量遗迹、遗物，多数包括数期遗存，从早至晚，前后延续。其陶器仍以鬲、甗、罐、盆、豆为主，反映了商代与先商时期一脉相承的文化特点。在磁县下七垣和武安赵窑遗址内^[22]，还发现数十座墓葬和很多散乱人骨，墓室规模及随葬品数量差别较大，小型墓无随葬品或仅随葬一二件陶器，大、中型墓葬底部多有腰坑，并以狗殉葬，随葬品数量也较多，除陶器外，还有青铜器和玉石器等。铜器以兵器为主，另有鼎、簋、觚、爵、尊、罍等容器，不仅器物造型古朴厚重、花纹繁缛、工艺精湛，而且有的还有“启”“受”“矢”等族徽或铭文。凡此种种，既显示了殷商青铜文化的灿烂辉煌，也为研究商代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状况及邯郸境内各氏族集团的分布提供了依据。

西周时期，邯郸虽处于周王朝的控制之下，但当地居民基本上仍以殷商遗民为主体，自商贵族叛周而被西迁洛邑后，商部族的势力明显减弱，并导致邯郸经济急遽衰落。目前，邯郸境内仅发现西周居落遗址数十处，经过发掘的有邯郸龟台、磁县下潘汪、界段营、永年榆林遗址等。遗迹包括房基和灰坑两类，其中下潘汪遗址灰坑内曾发现三具被砍死或倒缚双臂并经焚烧的人骨，估计当属奴隶阶层。遗物包括陶、石、骨、蚌器及铜镞，其中陶器主要为鬲、豆、盆、罐、瓮等，文化面貌既存在着显著的商文化特点，又带有浓厚的周文化色彩，显系两种文化的交汇与融合，这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是完全一致的^[23]。

（四）东周秦汉考古

邯郸东周秦汉考古最显著的特点，也可以说均与赵国的兴衰存有某种联系。从春秋末期赵氏集团邯郸争夺战开始，到战国时期赵迁都邯郸，乃至东汉时期赵郡国彻底衰亡，考古资料中均留下了当时的实证。

春秋时期是诸侯争相称霸、社会急剧动荡的时代，目前，邯郸境内此时期最重要的发现当属武安午汲古城遗址的调查与试掘^[24]。该城址呈不规则长方形，城垣大部分保存尚好，且四壁还分别保留有宽10米以上的门阙豁口，城区总面积约68.8万平方米。在城中共探明东西向主路1条、南北向支路4条，在城区西半部探明古墓、窑址、水井、窖穴、灰坑等146处。经发掘的遗存包括春秋时期陶窑1座、古墓10座，随葬品以鬲、盆、豆或鼎、盆、豆较常见。据此可知，午汲古城早在春秋时期即已出现，且很可能就是文献中经常出现的邯郸午的封邑“五氏城”或“寒氏城”，春秋末期赵氏集团长达数十年的邯郸争夺战就是由此而开始，所谓“午汲”或许就是邯郸大夫赵午、

赵稷父子二名的合称，甚至还与早期邯郸城存有某种瓜葛。

战国时期，邯郸是赵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自然也是邯郸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当时最显著的进步是城市经济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城市或城堡等中心居聚或军事据点的大批涌现。其较重要的考古发现，除赵都邯郸故城之外，还有永年阳城，峰峰界城，磁县讲武城、九龙口、西清流，武安固镇、店子、邑城、继城、北安乐、曹子港、刘庄、小店，涉县寨上等10余处古城址。阳城古城多认为属赵国的陪都信宫所在地，西清流古城为伯阳城址，固镇古城为早期武安城址，但最重要的收获还是赵邯郸故城的发现与研究^[25]。现已基本查明，过去认为属赵国都城遗址全部的赵王城，只不过是赵都的宫城，占地面积约505万平方米，今邯郸城区6~10米的地下，南北长约4800多米、东西宽约3200多米、占地面积达1380万平方米的古城，则是当时工商业活动及市民居住的郭城；对赵邯郸故城的建筑年代、城区布局与功能、建筑设施与特点、人口数量与经济等均有了一定认识，如赵王城西小城宫殿基址的中轴线布局、阶梯式城垣上的覆瓦和排水槽道、大北城内工商业区的分布等，均取得重大突破。此外，赵王陵3号陵大型陪葬墓——周窑1号墓长达77米的“中”字形墓室、外石内木双层椁室及墓道内车马坑、殉葬坑的发现^[26]，涉县北关大型“积石积炭”木椁墓中七鼎及编钟、编磬等成批铜、石礼乐器的出土^[27]，百家村与齐村战国贵族墓群中的殉人现象和车马陪葬坑的发掘^[28]，以及邯郸西郊数百座战国墓葬的清理，对研究当时的墓室结构、丧葬特点、等级制度及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秦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短暂的时期，由于考古资料所限及研究工作尚不够深入，所以除邯郸城郊部分战汉之交以少量生活用具和饰品随葬的墓葬可能为秦墓外，尚无其他重要发现。

两汉时期的文化遗存在邯郸境内有着广泛的分布，这与汉代数百年相对稳定的社会状况及邯郸曾为赵郡国的国都是分不开的。据调查或发掘资料可知，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城邑居落多数仍在继续沿用，除赵都邯郸外，有的已发展成县邑，如永年阳城的易阳城址、武安固镇的武安城址等，而且城址周围多发现有大片的墓地或封土高大的贵族墓群，如邯郸城西南的插箭岭、林村、西小屯、北张庄、车骑关、林峰、张庄桥墓群，永年阳城周围的东阳城、西洺阳、临洺关、西召庄墓群，故城村附近的北卷子、小龙马、曲陌墓群，武安固镇周围的棋盘地和王场地、邑城附近的紫罗墓群等。其中赵都邯郸城最重要的收获是，基本上确定了汉代的城区范围、宫殿区位置及主要遗迹分布状况，并在城区东半部发现了新的城址，大体搞清了内外两城的演变关系及兴衰过程^[29]。墓葬方面，车骑关“黄肠题凑”石室大墓的发掘及插箭岭、张庄桥大型汉墓中玉衣片和大批带铭铜器的出土，为确定赵郡国王公贵族墓葬的分布范围、丧葬制度提供了依据；而邯郸西郊和南郊近千座中小型墓葬的发掘，以及大批文物的出

土,则为两汉时期的丧葬习俗、手工业水平、经济与人口发展状况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此外,在武安境内还发现多处冶铁遗址,其中位于固镇古城东侧的遗址占地达37000多平方米,经调查和试掘,共发现3座炼炉,并出土了大量铁矿石、炼渣、铁块、炉具及数百件铁器、铁范、陶范和生活用具,铁器包括犁、铧、铲、镢、舌、铤、凿、锤、镰、刀、剪、顶针等20多个品种,是邯郸汉代考古中较重要的收获之一^[30]。

(五) 魏晋南北朝考古

自汉末曹魏时期开始,临漳邺城迅速崛起,且历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各代,相继为都,代邯郸而成为本区乃至北方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因此,当时的文化遗存也基本上以邺城及其附近的磁县最丰富,而邯郸、峰峰、涉县、武安、永年、成安等地虽都有发现,但数量相对较少。

曹魏至北朝时期,最重要的考古收获是对邺城遗址的勘探调查与发掘。邺城遗址分邺北城和邺南城两部分,前者自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平袁绍后开始营建,其后曹魏、后赵、冉魏、前燕均建都于此;后者系东魏北齐时期新建,而前者仍继续沿用,至北周大象二年(580年)相继被毁,前后延续达370余年。现邺北城东、南、北三面城墙已基本探明,西墙也已得到线索,探明了中阳、凤阳、广阳、建春、广德5座城门,中阳、凤阳、建春、广德门4条大道,以及10余处夯土建筑基址的位置,确定了宫殿、苑囿、戚里、衙署、居民区的分布范围,并对都城规划中的中轴对称的特点及城墙上矗立的铜爵、金虎、冰井三台的用途和性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31]。邺南城依北城南墙而建,其余三面城墙均已探明,经实测,城区最宽处东西2800米,南北3460米,城垣略呈弧线弯曲,外侧筑马面,城角圆缓,城外有护城河,体现了浓郁的军事防御色彩;探明了仁寿、启夏、朱明、厚载、上秋、西华、乾门、纳义8座城门,并对南墙正中的朱明门进行了发掘,搞清了城门的规制和布局;发现了与城门对应的东西、南北向街道各3条,反映了主城区中轴对称、棋盘状布局的特点;在城中央偏北部发现了东西约620米、南北约970米的宫城,在宫城内及其附近探明15处建筑基址^[32],并在西南城郊清理出数十座烧制砖、瓦和釉陶的窑炉等^[33]。此外,还采集或出土了大量曹魏至北朝时期包括陶瓷器等生活用具和石螭首、石柱础、筒板瓦、“大赵万岁”、“富贵万岁”瓦当等建筑构件,以及陶人面饰、铁甲冑等文物珍品,为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及生产力水平提供了重要依据。

曹魏时期的墓葬,以邺南城西南侧及远郊磁县境内分布最密集,邯郸、永年、武安、涉县等地也时有发现。墓葬形制以大中型多室砖墓最常见,个别还装有石门,随葬品多为生活用具或明器,战汉以来反映等级身份的鼎、壶类器物明显衰退。西晋墓

多为零星发现,分土洞墓和砖室墓两种,全部为单室,有的装设石门,随葬品也以日常生活用具和明器为主。磁县城南一带所谓“曹操七十二疑冢”,实为东魏、北齐王陵及贵族墓葬的集中分布区,较重要的发掘有东魏茹茹公主、尧赵氏胡仁、湾漳大墓及北齐高润、尧峻、元始宗、元良、李尼墓等,多为皇族成员或王公贵族,规模宏伟壮观的湾漳大墓虽无墓志等文字资料,但据推测当为北齐文宣帝高洋的武宁陵。墓葬全部为单室,多设砖石棺床和多重封门,墓壁及墓道多饰彩绘壁画;随葬品以各类小型兵马俑、伎乐俑、镇墓兽、模型明器较常见,另有陶瓷器、金银器及墓志等。壁画内容以青龙白虎为先导的仪仗出行队伍、墓主起居生活与侍从图像、羽人神兽及星象图等最具特色,且色彩艳丽匀称,线条舒展流畅,人物栩栩如生,表现了当时高超的绘画艺术水平。陶俑中除常见的文吏、武士、艺伎和侍从俑外,湾漳大墓中还出有高达1.42米的大文吏俑,茹茹公主墓^[34]中出有萨满巫师俑等,不仅形象生动,制作精美,为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服饰装束、雕塑艺术提供了重要资料,而且对研究墓主的身份地位和民族文化交流也具有很高价值。茹茹公主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反映了北朝时期的中西交通贸易史实,而翔实的墓志资料,不仅为判定墓葬年代提供了直接证据,且对证史之误、补史之缺也极具参考价值。

北朝时期的佛教遗存也非常丰富。其中石窟寺院遗迹主要包括峰峰南、北响堂寺石窟,水浴寺(小响堂)石窟,涉县娲皇宫石窟,艾叶蛟石窟等,并以南、北响堂寺石窟最具代表性,在中国佛教考古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外,1986~1987年对南响堂石窟晚期遗存拆除时,还新发现了北齐仿木建筑窟檐遗迹和7座佛龕^[35];并已查明,涉县娲皇宫中皇山北齐摩崖刻经包括佛经6部,共计13.1万字,是国内现存石刻中面积最大、文字最多、保存最好的早期佛教经籍^[36]。寺院遗址和佛教造像,除邺城一带常有精美的石刻造像出土,并发现一批北魏时期带刻铭鎏金铜佛外^[37],1997年还在成安南街寺庙遗址发掘出土北魏至北齐石造像100余尊,其中20余尊有铭刻题记^[38],为北朝佛教史及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六) 隋唐宋元考古

隋唐至宋元时期,除磁州窑遗址开展工作较多外,其余多为零星发现。

隋代遗存以磁县贾壁青瓷窑址的发现较为重要,其中包括窑炉及碗、盘、豆等瓷器,说明早在磁州窑瓷器创烧之前,本区也是北方较重要的青瓷产地之一^[39]。佛教遗存主要发现有南、北响堂寺及小响堂石窟隋代窟龕,磁县赵王庙石刻,涉县林旺石窟及堂沟石窟等。其中1986年南响堂寺石窟新发现的《滏山石窟之碑》,为确定该石窟的开凿年代、周武帝灭法、石窟命名等提供了可靠的依据^[40]。

唐代遗存在邯郸、武安、磁县、临漳、永年、鸡泽、邱县、大名等地均有发现或